



21世纪人类学文库

政治人类学 通论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修订版)



何国强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21世纪人类学文库》书目

已出版

- 《文化人类学论纲》
- 《发展人类学引论》
- 《哲学人类学导论》
- 《影视人类学原理》（引进版）
- 《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引进版）
- 《生态人类学》
- 《体质人类学》（修订版）
- 《体育人类学》
- 《人类学导论》
- 《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与方法》
- 《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的采集、保护与传播——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项社会人类学调研》
- 《政治人类学通论》
- 《旅游文化学》（引进版）
- 《卡尔·马克思，人类学家》（引进版）
- 《政治人类学通论》（修订版）

政治人类学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通论
(修订版)

政治人类学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通论

(修订版)

责任编辑：蔡红华

装帧设计：刘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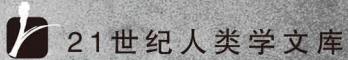
上架建议：人类学

ISBN 978-7-5482-2460-0



9 787548 1224600 >

定价：40.00元



政治人类学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通论

(修订版)

何国强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人类学通论/何国强著. —修订本.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
(21世纪人类学文库)
ISBN 978 - 7 - 5482 - 2460 - 0

I . ①政… II . ①何… III . ①政治人类学 IV .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5807 号

政治人类学通论 (修订版)

何国强 著

责任编辑：蔡红华

装帧设计：刘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宝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5.5

字 数：405 千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2 - 2460 - 0

定 价：40.00 元

地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发行电话：0871 - 65031071 65033244

邮 编：650091

E - mail：market@ynup.com

第十三届云南省优秀出版物一等奖

“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精品推荐

本书为教育部“十五规划”基金项目“政治人类学理论、方法和学科的本土化研究”（批准号：01JA850003）的最终成果

课题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



《21世纪人类学文库》编委会名单

主 编：尹绍亭 施惟达 周大鸣 瞿明安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京 方 铁 王建新 尹绍亭

邓启耀 刘昭瑞 杨 慧 何国强

沈海梅 张 实 周大鸣 周永坤

施惟达 麻国庆 蔡红华 瞿明安

《21 世纪人类学文库》总序

中国的人类学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重建，到 90 年代以来，呈现出兴盛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培养问题。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发展成熟成为学科的骨干力量。这些学者大多集中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其中许多人在国外求学数载，直接沟通了中国和世界的研究。

2. 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显示出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具体的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人类学工作者自我超越原有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学又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以期取得研究上的新突破。如有的高等学校利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学科整合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界线，达到各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互渗和借用。这种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催生新的边缘

学科，并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法，同时，多角度的研究取向更易于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同时，有关人类学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大大增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召开的有关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达七十余次。这些高层次的研讨会既整合了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又扩大了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影响。

3. 学科建设取得重大成绩。2002年1月，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的民族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这为新世纪人类学民族学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目前，全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如中山大学有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有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四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获得了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相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分别开展了规模较大的科研项目，特别是云南大学先后两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村寨调查，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出版了一套完整的民族村寨调查丛书。中国的人类学界必将以丰硕的研究成果，迎接2008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中国（昆明）的召开。

4. 人类学知识的应用与普及已开始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百多年前，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说过，人类学是改革者的学科，人类学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学科。费孝通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来看，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应用性，到90年代已能直接介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人类学专家在区域文化策划、综合社会评估、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西部大开发中，人类学专家参与的民族省区文化与发展战略研究、人文旅游规划、文化设计和社会评估已多次用于云南、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省区的政府咨询和决策。

另外，由于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特殊的资源优势，人类学学科较易于直接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研究。如人类学者直接参与社会发展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批人类学者参与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在华的发展项目的评估。在这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参与的南昆铁路的建设对沿线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人类学家参与的艾滋病与人类行为的研究，云南大学人类学家主持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中山大学对江西、新疆、甘肃、宁夏、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等地的社会评估，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人类学对社会发展的实用价值。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学在行动”。

不仅如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方式。人类学研究的边缘视点和“异文化”视角使之能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比如说，人类学对民俗的研究已在改变人们对农民生活方式的看法，人们对他们的宗族观念、他们的民间信仰仪式等都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而不是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斥之。对人类学知识的应用要有一个普及化的过程，让人类学的知识真正服务于人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走向人民”。这是知识回归大众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增多，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类学研究的“异文化”视角为我们消解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提供了工具。

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为了适应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和本土化发展的需要，由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原先研究的基础上，组织有关学者编写了一套反映当代人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系列教材《21世纪人类学文库》。厚积薄发，正是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使今天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蔚为大观。这一套教材凝聚着编著者的心血，而长期以来许许多多人类学者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今日学科发展的汪洋大海，则是这一套教材编

写的不竭源泉。“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如果说弗雷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预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为期不远的话，我们愿这一套教材的出版能引导更多的雏凤走上对人类学的不懈追求之路，催生人类学的中国时代！

《21世纪人类学文库》编委会

2005年10月

自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办有人类学、民族学系科的院校，先后开设了政治人类学课程。由于学校、系别、专业的差异，着眼点稍有不同。有的列为选修课，有的列为必修课。但教学目的大致相同，都是通过讲授这门课的研究对象、原理和方法，拓展学生的视野，使之熟悉人类学看待政治文化的视角和方法，培养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

自1989年9月起，我在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讲授政治人类学这门课，每周两节，一学期下来，共上了36节课。因得到学生的欢迎，第二学期作为全校公共选修课继续开设。当时苦于无合适的教材，为长远计，乃于1990年2月编撰了一部油印讲义，印制四五百份，存于库房，以应教学之需，新课就这样一步步支撑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许多困难，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系主任王乐夫要求我再开一门新课，这就要分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使我不能专注于政治人类学；二是我并非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出身，有些问题的讲解不够深度。1994年，我写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一书，作为新课的教材，标志着完成了系领导交给的任务；同年考上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始调整知识结构，转变身份。

2001年2月，在岭南大学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于2001年9月至2002年3月到美国西密歇根大学（WMU）科学与艺术学院人类学系交流。2001年12月，我提交的课题申请获得教育部“十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2006年4月，我又得到佛里德曼基金会

资助，于 2006 年 6 月至 2007 年 7 月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 - 香槟校区（UIUC）东亚 - 太平洋研究中心访学。我利用了这些机会接触到大量资料，认识了国内外经验丰富、成绩卓著的学者，增强了信心，鼓起干劲，积极准备撰写政治人类学教材。

我在教学园地并不孤单，许多同行都在辛勤耕耘。1999 年董建辉在厦门大学出版《政治人类学》。此书对于初学者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今天来看，它在中国大陆起到两点作用：一是传播了新知识，引起人们的注意；二是展示了应用人类学的新方向，使许多资料因注入新的理论方法而获得生机。然而董著的底本是特德 · 卢埃林的《政治人类学导论》^①，笔者在《政治人类学通论》第一版中已经指出，此前也有人委婉地点出^②，这里就不多说了。十年之后，朱伦翻译了卢埃林的这本书^③，使广大读者能够窥见原著的基本面貌。由于该译本少了一章，因此不能构成忠实的译本，这一点《政治人类学通论》第一版中也指出了。

为了推动政治人类学的教学，弥补国内研究的不足，我集合了几位学者撰写教材。鉴于 1990 年的那本油印讲义有猜谜、射覆的习气，为了使新教材建立在扎实的科学基础上，故将其抛弃，另辟蹊径，重新考虑内容与结构。我费时费力地梳理中外文献、提炼概念、归纳命题、琢磨原理，在田野调查中寻找证据、增加感悟、深层解读。冬去春来，时光流逝，虽然难产，并未放弃。古人云：“十年磨一剑”，迄今二十年了，新教材终于写成。二十年间，我有十余次讲

^① Lewellen, Ted C.,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Bergin & Garvey, 1992. 卢埃林生于 1940 年，出版该书时为美国弗吉尼亚州 Richmond 大学的人类学副教授。

^② 参见暨爱民、彭永庆《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述评》，载《广西民族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49 页；又见《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历程》，载《政治人类学评论》2015 年第 1 辑第 166 页，此刊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政治人类学研究所主办。

^③ [英] 特德 · C. 卢埃林著：《政治人类学导论》，朱伦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授政治人类学的教学经验，有纵向课题的支持和专家的建议，有两赴国外的交流经历，有把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律学一炉共冶的尝试，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写作是我的运气。

考虑到教学的实际需要，将这本教材定名为《政治人类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可能更合适些。政治人类学有其独特的理论架构和学科特性，自 20 世纪 80 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已占有一些地盘，市面上、网络中不乏介绍性的资料。目前奢谈理论的人多于深入实际的人，如不转移重点，政治人类学迟早会被带入死胡同，因此必须从介绍工作到实证研究，两步并做一步走，“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①。而以“通论”的形式架构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联，体现了二者良好的融通，会使这门学科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有鉴于此，《通论》贯穿了学理化和通俗化相统一的原则，首先，在材料取舍上厚今薄古，洋为中用，注意学科应有的现实关怀，这是通俗化的初步；其次，深入浅出地阐述原理，论述周密，行文简洁，扫除故弄玄虚的一套，这是通俗化的内在要求；第三，指出社会的基本事实，例如，婚姻、教育、各种地域组织、因特网等等新旧事物，揭示其中的政治意味，通过适当的介绍与分析，创造深入研究的可能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勤于观察，这是通俗化的更高要求。

根据教学的需要，考虑到人类学与政治学，乃至其他学科的关系，考虑到人类学专业本科阶段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本书抓住那些古老而常新的课题，通过章、节、目、点，一路剥离，层层展现人类学与相关学科的交结，尽可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当代学术研究

^①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载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 页。

的最新成果和编著者的独立见解。例如，在阐述政治演化的时候，利用“酋邦”概念在部落和国家之间搭桥，在讲国家的时候，划分出原生和次生两种形态，把重点放在原生国家，并且以生产关系来过滤生态适应，整个过程有分析，亦有综合，较为透彻地阐述了国家起源与人口压力、土地资源、取食方式、强化生产等因素的关系，既让人类学专业的学生看到政治学的逻辑力量，又使政治学专业的学生闻到人类学的实证趣味，而不是简单胪列，重弹旧调。因此，突出专业特点，是“通论”的基本要求，这样做没有疏远非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反而吸引了他们。

《通论》包含了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知识覆盖面较广，适应性较强。如前所述，政治人类学在中国开设已有 20 多年了，不同的研究机构和学校对之取向不同，知识结晶各异。《通论》从总体上看虽然侧重于人类学专业，但兼顾到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宗教学、生物学方面，便于相关学科选用和参考。

第二，教学目的和要求比较明确，把“培养学生具有从人类学和政治学相交的维度来了解文化的初步能力”^①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基本要求，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一种理论、一个观点讲得天花乱坠，但连一个文化事项都解释不出政治蕴涵来，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为此，《通论》除在考虑章节详略得当、层次分明、线索清晰之外，还安排了一些便于学习的路径，比如，各章末尾拟出思考题供复习巩固；有些章还归纳要点，出示例题，便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每章开出有针对性的书单供深入钻研，利于启发智力，掌握更多的材料，至于参考书目的列举，则本着方便寻找的原则，以国内出版物为主，境外出版物为辅，中文为主，英文为辅；

^① 参见本书第 1 章第三节，学习政治人类学的意义和原则，以及名章末尾的附加内容（如结语、思考题、参考书目等）。

《通论》所提出的观点，尽量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正文援引的材料，均在页下注明出处，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第三，体例上有利于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全书共分 11 章，第 1 章是概论，理论性较强，纲举目张地支撑起全书篇目体系，将各层次的联结点是什么概念，研究取向是什么范式，新旧学派的贡献与地位，前后继承与超越关系等等，一一道出。第 2 章把政治问题向前推到猿人时代，使学生看到政治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倾向，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政治，但不可能逃避政治。第 3 章讲政治演化，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若即若离，即的是坚持、发展和深化，离的是吸收新的理论模型和新材料。第 4、5、8、9、10、11 章各讲一个领域，展现了政治文化的多姿多彩。第 6、7 章揭示任何一个地域都存在的民间政治组织。以上各部分既互相联系，又互有补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体系有利于在教学中贯彻一般原理，通过普通知识由微见著，由小见大；反过来，又可以用具体材料来验证理论与知识之是否符合实际，进而判明其正确的程度。

第四，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力求反映最新学术水平。《通论》的篇幅不多，涉及许多重大课题，在介绍和论述的过程中，不仅注意总结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治学方法，而且力图反映近年来的新成果和新进展。著者寓作于述之中，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参考各家说法，择其善者而从之，或在介绍中表明自己倾向性的意见，尽量做到准确、客观地反映当代学术水平。

当然，犹如一个带着血迹出生的婴儿，《通论》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限于体例和篇幅，未能一一注明所引的论著名称和出处，望读者予以谅解；又如，第 1、2 两章的内容互有脱节，这两章和后面的 9 章也互有脱节，由此形成的空缺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填补，注意发挥概念的渗透能力，使前后结合起来；还如，第 1 章抽象些，后十章显得具体些，因此，后 10 章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讲授，有一部分可留给学生自己阅读，借以培养其钻研精神。使用本教材的教

师，也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讲授；再者，个别章（如第9章）内容比较单薄，有两章（第5章、第10章）的政治性不够强，应该在教学中补充实例；还有若干问题，考虑到有些学校另有研究类或讲座性质的课程，为免重复，本书未作专题介绍，免却面面俱到之嫌。

2005年，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云南大学出版社共同达成协议，决定出版一套《21世纪人类学文库》，“政治人类学”被列入其中。这本《政治人类学通论》的出版，不但可应兄弟院校选用教材的急需，也是两校文科系列教材建设的一项有意义的尝试。通过更大范围的教学实践，政治人类学必将获得更大面积的丰收；对于本书的充实和提高，也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原讲义之前言一仍其故，以记旧貌。

何国强

2010年11月28日

中山大学西北区榕树头

前　　言

这本讲义起因于两年前的一个动机。当时我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为了撰写硕士论文而到处收集资料。我的论文题目为《论巫术的联想思维和文化功能》，是从认识论角度阐释巫术信仰，侧重于探讨巫术操作者的思维程序。之所以选做此题，一是不满足于哲学的纸上谈兵，欲做一点实际问题的研究；二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巫术较多，而哲学的剖析很少，我的知识结构和兴趣大有用武之地。研究欲望推动着我阅读了大量文献，还约了一位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一起去西南民族地区调查。

在记录、剪贴、制作卡片、消化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无意中收集了很多属于仪式象征、权力控制、策略计谋方面的材料，不能全部用于论文，弃之可惜，只好留待将来使用。在梁裕楷、叶汝贤、陈长畅等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论文，取得学位。经梁老师推荐，我留在哲学系政治学教研室任教。不久成立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我就到了新系，开始筹划把这些资料用于政治学研究，开出一门新课。经过半年的准备，材料、理论、观点都有了，撰好教学提纲，定名为“政治人类学”，1989年秋，在本系讲授。这门课引起同学们的专业兴趣，产生了意外的反响。反馈的信息中有热情的鼓励，也有具体的建议，促动我趁热打铁，补缀提纲，撰写讲稿，交给学校教材科审核，争取在新学期向全校推广。

1990年的寒假，我在康乐园里，白天握管不止，夜里厮守一盏孤灯，每天工作12小时，熬了一个月。一边整理平日的研究心得和